



《循环日报》当时的销路，现在已无法可知，但从其订售点之多，可以想见。1874年5月20日刊登的《中华印务总局告白》称：该报“在国内各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华人驻足之处，皆有专人代理销售业务”。订售点分布在广州、澳门、佛山、东莞、厦门、福州、牛庄、京都、日本横滨、安南西贡、新加坡、旧金山、新金山、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以及日本长崎和神户等，总计订售点有30多处，在广东的订售点有9处，可见其销售网络相当大。当时国人对报纸不甚关注，但《循环日报》创刊后，其无隐无饰、直言不讳的作风和客观及时的报道，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创办中途，“各埠士商报名取阅者源源而至”^①。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以报纸这种方式对人民大众进行西方知识的普及，《循环日报》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容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1850年的耶鲁大学，可能不似今天的显赫和具有世界知名度，但在这一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至今令中国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它吸收了一名中国青年进校读书。这个青年来自广东香山县，名叫容闳。正是这个受过耶鲁大学熏陶的青年，20多年后，以中国官方代表的身份带领120名中国幼童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美、胡锦涛主席2006年访美，都特别提到耶鲁大学和容闳的名字，并以此作为中美人民200多年友好交往的光辉例证。

一、走进耶鲁大学

容闳（1828~1912年），是南海之滨（具体地点是今珠海市的南屏镇）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到了7岁上学的年纪，他的父亲连送他进私塾读书的学费都几乎交不起，是什么机遇使他进入美国的大学读书？今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晚清时期到外国读书是非常冒险和无奈的事。因为贫穷，容闳才被他的父亲送到基督教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这种学校不收学费且供食宿）。而因，为想找到一份买办或通事

^① 见《循环日报》1874年7月4日。

之类薪水较好的职业，容闳在马礼逊学堂毕业后，家人又同意他跟随他的老师布朗博士赴美求学。在鸦片战争前后，这并不是令人羡慕值得炫耀的事情，相反，在交通极其落后的年代，远赴异邦骨肉分离的痛苦、漂洋过海艰难险阻的旅途、背井离乡人地生疏的困窘，都使国人把出洋视为畏途。

但是，容闳毕竟是受过9年西式教育的人，观念更新，眼界比一般人开阔，在教会学校读书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意想之纽约游》，对神奇的西方世界充满了求知的渴望。1847年，他终于到达他向往已久的纽约。

麻省的孟松学校是美国当时最好的预备学校，布朗博士为他和另外两名学生黄宽和黄胜办好了入学手续，他心地善良的母亲则当了他们的监护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两年后，容闳决心继续留在美国求学并把考入耶鲁大学作为努力目标，他对渴望他尽快回乡挣钱养家的母亲说出了这个愿望，请求她的谅解。容闳说：“自从来到这个国家，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英语，到去年冬天又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以求符合大学的要求。”^①

入学考试可以凭自己的努力，但学费如何筹措呢？孟松学校有一种为贫困生设立的奖学金，但受到资助者必须签订一个合约，承诺毕业后当一名传教士。容闳拒绝了，他认为传教并不能使他为自己的国家谋取最大的福利。幸好，布朗博士想方设法为容闳争取到一个妇女协会的帮助，终于使他如愿以偿。

作为耶鲁大学同时也是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学生，容闳的表现令人钦佩。他的同窗好友白博士在60年后还以非常欣赏的口吻对他的学生、留美的胡适说：开头，容闳的异服异俗颇受人笑，但他两次在班上的英文比赛中得到一等奖后，便无人敢于揶揄他了。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背后拖着一条小辫子的容闳很快就成为校园人物。容闳内心却是孤独的，对家乡和祖国的思念时时煎熬着他。他托人带信给正在中国办报的美国人卫三畏，央求他把中国亲人的信息告知，他说：“我已经好久未得到家中的消息了，我的母亲是否还在人间？请写信告诉我一切重要的事情。”^②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内乱蜂起的消息更使他心情沉重，坐立不安。他说：“我要使我们的下一辈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到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③ 容闳在美国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后，认为复兴中国的道路要从学习西方开始，这种认识在

① 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② 1852年12月30日，容闳致卫三畏牧师英文未刊信稿，现藏耶鲁大学图书馆，转引自高宗鲁《容闳与中国留美幼童》，载《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③ 容闳：《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王蒙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3页。

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无人能及，在国人对美国和世界知之甚少的年代里，容闳是真正了解美国和西方的第一人，沟通中美文化的历史重任落在他的身上绝非偶然。

1854年，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因为有容闳这位大清帝国的子民而显得颇为轰动。人们远道而来观礼，知名学者布什内耳特地从哈特福德城赶来，为的是结识这位在报刊上谈论中国问题的青年。从容闳的毕业照可见，他已经剪去了辫子，外表完全西化，因居留美国已久，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而他在中国除了卑微的亲属之外，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记了，他的前景是黯淡的。他也并非不想留在美国，但是正如他的好友吐依曲尔说，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不会让他图私自利，不管前途如何，他还是决心回去。

二、艰难的破冰之旅

1855年，思乡深切的容闳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回到了久别的中国。从这一年归国到1872年他带领首批留美学生重新走进美国的校园，整整经历了18年之久，其中的艰难曲折，恐怕他从耶鲁毕业时是没有料到的。在深闭固拒、守旧盈廷的晚清，一个平民百姓，要说服政府往外国派出留学生，几乎是痴人说梦。

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容闳就目睹了一场血腥大屠杀：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响应太平天国的陈开、李文茂起义。政治的动乱，使他无法提出自己的教育设想。1855~1863年，他先是在香港高等法院当译员，后到上海海关当译员，又曾在英商公司为书记，都为时甚短，经常失业。在动荡、漂泊无定的生活中，他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广州刑场上目睹叶名琛滥杀7.5万余多人的兽行使容闳认为，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残暴的清王朝。1860年，他走访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干王洪仁玕陈述了包括政治、军事、实业和教育等7点建议，因为与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一致，他还提出以基督教的圣经取代中国伦理道德。洪仁玕很重视他的意见，但当时太平军正在打仗，无法实行。经过观察和分析，容闳对太平天国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产生了怀疑，终于没有接受洪仁玕授予他的“义”字四等爵封号，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为寻求实现理想的依托力量，他在1863年进入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府。曾国藩网罗容闳的目的是想办军械所，所以容闳只好把自己的打算暂时收藏起来，为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值得一提的是，他成功地说服曾国藩把引进机器母机作为创办工业的起点，使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少走了一些弯路。1865年机器运回中国，筹建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机器工厂——江南制造局。容闳因精通西学而为曾国藩所器重，但要说服清政府接受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就不是那么容易了。1868年，容闳首次向洋务大臣丁日昌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设想，得到了丁日昌的大力支持，但丁的条

陈却被“留中不用”。当时洋务派正遭受守旧派的攻击，其中一条罪名便是“以夷为师，可耻孰甚！”

容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曾文正（曾国藩）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① 所以，他对曾国藩没有失去信心，只是静待时机。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容闳充任译员随丁日昌到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教案。中外冲突虽暂时平息，但民心难平，民情汹汹。容闳再次向丁日昌提出留学计划，并以教案为例说明中西增加了解、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许是痛感中国积弱不振，极须培养军事科学人才，在丁日昌的游说下，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派遣留学生，很快就得到皇帝批准。

10多年怀抱的志愿终于实现，容闳惊喜交集，夜不能寐，他写道：“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② 并预言，此事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开一新纪元。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美国驻华公使卫三畏对此均表赞许。作为容闳的老友，卫三畏很高兴看到容闳多年努力终于初露曙光。威妥玛则对李鸿章说：“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派往。”伦敦、纽约的报纸很快就报道了这件新鲜事，对清政府的开明举动，表示欣喜。

容闳在写给自己的老师、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的信中郑重地谈及中国政府的意图：“派遣幼童赴美接受完整教育，以备将来在中国政府各部门服务。——他们不得入美国籍，或留美不归，也不得中途退出自谋他业，因为他们是官费学生，正如西点军校和海军官校学生对美国政府有应尽的义务一样。”^③

1872年8月11日，詹天佑等第一批30名幼童奉旨钦赐官学生，穿上了官式丝绸长袍，束装就道，于9月12日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三、边缘人的困境

容闳是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著名大学学位的留学生。他在澳门和香港的教会学校读书9年，赴美留学8年，系统接受西式教育共17年。知识结构和道德观念已于此时定型，可以说是全盘西化。1854年大学毕业后容闳回到中国，其间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至1912年在美国去世。在这58年的日子里，有26年生活在中国，37年生活在美洲，可以说是一个中美两栖人。

他崇尚美国文化和制度，信奉基督教，早在1852年就归化为美国公民，后来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

③ 1872年2月17日，容闳致耶鲁大学校长Noah Porter未刊信稿，现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又娶美国女子为妻，视美国为其第二祖国。同时，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始终保有一颗中国心。但他的洋学生出身，使他很难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特别是介入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之中，甚至难以得到某些权势人物真正的信任、接纳和支持，这对他的事业是一个严重的制约。虽然他手订留学计划，但由于没有科举入仕的背景，只能充当副职。首任出洋肄业局正监督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他没有出国经历，对西方世界十分陌生。接任者也都是“中国饱学之文士”。李鸿章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①。

当容闳第一次回国时，在香港的海域上，竟不能用中国语说出“暗礁”和“沙滩”，自己也颇为尴尬。后来不得不花半年时间向一个外国传教士学习粤语。由于他的中文根基甚浅，日后他的条陈基本上请人捉刀，而其生平自传《西学东渐记》也只能用英文写成。虽然如此，他对晚清政治的黑暗腐败、官场的贪渎无能、人民的愚昧无知，感受却比别人痛切，提出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思想也为国内最早。由于对美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教育有较多了解，他多方面地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设想。而他的大多数设想落空、行动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也和他的边缘人身份有关。

幼童留学方式及其实施对保守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激进了，引起很大的争议。因而，它不断地遭受来自各方面的猜疑、干扰，甚至破坏。不但守旧派认为幼童“抛荒中学”、“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学成亦不能为中国用”，连号称洋务干才的驻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也说：“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② 与容闳共事的历届留学事务所正监督囿于狭窄的知识范围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幼童的游戏、运动、剪辫、信教等西化倾向统统视为大逆不道，攻击不遗余力。容闳和他们激烈地争论多次，结局是李鸿章命他不要固执己见，对幼童也不必多管。从此，正监督吴子登把持了出洋肄业局。吴对幼童的越轨行为十分震怒，说：“若令其久居美国，必至全失其爱国之心。”^③ 他和陈兰彬都力主解散出洋肄业局，撤回留学生。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掀起排华浪潮，中国留学生要求进入军事学校也遭到拒绝。这使清政府感到花费如许金钱送学生出洋殊为不值。1881年，朝廷谕令4批共120名留学生全部回国，其时只有詹天佑、欧阳庚从耶鲁大学毕业，其他学生都正在各大、中学就读。中途退学，不论对学生本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05~1908年）印行，第34页。

^② 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损害。

留学计划中途夭折，容闳一生的梦想归于破灭，不由仰天长叹：“苦心孤诣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可行的办法。随着 120 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从而告终。”^①

虽然如此，令容闳稍感欣慰的是，120 名幼童回国后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工作，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贡献突出。其中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邮电业奠基者朱宝奎、黄开甲、周万鹏、唐元湛，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吴仰曾、邝荣光，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中国第一代海军将领容尚谦、蔡廷干、徐振鹏，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唐绍仪、梁敦彦、梁诚……这些事实证明，容闳无愧于“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

四、“从头到脚，他身上每一根神经都是爱国的”

容闳的报国之心，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已经树立。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当时立下的志向：“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用，不必遂大有为，或亦不难造一新形势。”^② 所以当留学计划横被摧残之后，他仍然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中国的盛衰安危，尽管他已经不再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1883 年，正在中国述职的容闳因为美籍妻子病重而返回美国。1886 年，爱妻病故，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容闳“以严父而兼慈母”，尽心尽力抚育儿子健康成长。在幽居的日子里，容闳心系故国，郁郁寡欢。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容闳写信给他的旧相识、时在主战派张之洞幕下效力的蔡锡勇，提出一个向英国借款募兵购舰与日决一死战的建议。张之洞决定委派容闳赴伦敦筹款项，容闳当即赶往英国。正在洽谈之际，借款之事被李鸿章否决，张之洞奏保容闳归国效力。容闳把张之洞的电召看成是祖国的召唤，心潮澎湃。他把两个正在读中学和大学的儿子托付亲戚朋友照管，毅然归国。

1895 年，阔别祖国 13 年的容闳回到上海。此时，中国已经战败并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容闳有关自强新政的建议也因太新、太激烈而未得到张之洞的采纳。容闳并不气馁，他与留学归国的黄开甲合作翻译了美国的《国家银行法》等一批书籍，携书北上赴京寻求财政大臣翁同龢、张荫桓的支持，又呈上《铁路条陈》，倡议成立铁路公司，设立铁路学堂，引进外资修建铁路。他的主张得到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却遭到心怀叵测的人恶意攻击，终于流产。容闳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治腐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 页。

败，认为不改革政治体制不足以救中国。1898年，“百日维新”发生，改革风潮遍及京师。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梁启超认为“容纯甫（容闳）非常才人也，可以为胜、广（陈胜、吴广）”，容闳的寓所成了他们秘密集会之地。当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发兵勤王之夜，梁启超便在容的寓所等候消息，后来得知袁不能举兵清君侧，才决定避走日本。戊戌政变发生后，容闳因有涉案嫌疑，逃到上海租界避祸。

在“托迹租界”的日子里，容闳并未停止谋求维新的政治活动。1900年7月20日，他与维新人士唐才常等组织“中国国会”，被推选为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自立军的对外文告，明确宣告要建立一个立宪政府，废除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予之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容闳被通缉，不得不逃亡日本、隐居香港，最终被迫回到美国度过他一生的最后10年。

对清政府完全失望的容闳决心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邀请孙中山到美国，请军事家荷马李和财政家布恩与孙中山会谈，商定发动起义的事宜，给了孙中山极大的鼓舞。不幸，筹划中的“红龙计划”因为筹款无着而搁浅，容闳也病倒了。1912年年初，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83岁的容闳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立即写信给香港的爱国华侨谢缵泰，请他代为向孙中山致贺，并说：“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①孙中山热诚邀请容闳归国辅政，称他为“老同志”。但是邀请函寄到美国时，容闳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于1912年4月21日病逝，终于未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祖国。在他死后，他的两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遵循他的遗愿，先后回国服务。

容闳是一位为中国近代化开辟道路的先驱者，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美国牧师吐依曲尔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演说中，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容闳：“从头到脚，他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山河和伟大历史。”^②

^①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